

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 文化适应的影响研究

■ 高万红 王 垚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昆明650000;齐齐哈尔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0)

【摘要】本文基于云南省怒江州两所小学高年级学生的1075份调查数据,探讨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策略越积极;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呈现出留守差异和性别差异,表现为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的影响大于非留守儿童,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女童的影响大于男童。因此,在易地搬迁社区建设中,应增强儿童的社会资本建设,以个体和集体社会资本推动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尤其要重视对留守儿童和女童采取针对性和个别化的干预措施,进一步促进其在新社区的生活适应和社会融入。

【关键词】易地搬迁 社会资本 留守儿童 文化适应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4.013

一、问题提出

为解决我国贫困群体的生计发展问题,改善其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自2001年起,国家开始施行易地扶贫搬迁工程。2020年末,历经19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胜利收官,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所有贫困县脱帽。目前,虽然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经完成,但迁出原住地的一些居民还面临着在新社区中生计发展和社会融入的问题,尤其是易地搬迁社区的儿童,他们面临着生活环境、学习环境、文化环境的多重变化^[1],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面临很多困

收稿日期:2024-05-10

作者简介:高万红,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健康社会工作、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

王 垚,齐齐哈尔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社会工作教研室讲师,云南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大学示范性跨校实习基地建设、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基地建设项目“云南怒江州易地搬迁社区乡村振兴社会工作跨校联合实习基地建设”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难。文化适应是指接触不同文化的个体在价值理念、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发生改变的社会心理现象^[2]。根据贝利(Berry)的文化适应压力模型,文化适应是一种压力体验,文化适应者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心理健康状况下降的现象,这一现象受到个体多种心理社会特征的调节作用^[3]。高文化适应水平能够正向促进移民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4-5];反之,固守、放弃、回避等消极文化适应策略对儿童的心理健康起负向预测作用^[6]。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目前多项研究证实了社会资本对儿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些研究多从单一角度出发,如家庭、学校社会资本^[7-8],未能考虑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社会融入是乡村振兴中需要重视的问题。社会文化适应是社会融入的核心和前提,有关研究普遍认为生态系统中的微观、中介、外部和宏观环境对儿童的文化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家庭、学校、社区等微观环境影响最大^[9-10]。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儿童发展的重要微观系统,构建多维度儿童社会资本量表,拟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2)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是否存在留守差异?(3)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以上研究对验证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提出促进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城市社会融入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儿童社会资本的测量

学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并未形成定论,社会资本在概念化和操作化测量中产生了分歧。布朗(Brown)将社会资本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分别对应个人通过社会关系获得资源的途径、在所处社会结构位置中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行动者群体对资源的占有情况^[11]。阿德勒(Adler)等人将社会资本分为外部社会资本与内部社会资本,外部社会资本包含了上述的微观与中观资本,即帮助个体获得资源的外在关系;内在社会资本与宏观社会资本相对应,即能够促进群体团结的内部关系^[12]。遵循传统分类方法,我国学者多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集中于“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个人使用的社会资本”两个方面。测量“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的主要方法包括提名生成法、位置生成法以及网络规模、网络密度、位置以及嵌入的资源等;“个人使用的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对于非正式网络途径的选择、社会网络中流动的资源以及关系人的特征。集体社会资本主要用信任、公共参与和社会连接、社会网络结构、社会规范等来测量^[13]。

然而,上述提到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不能全然用于测量儿童的社会资本,如提名生成法、位置生成法以及嵌入的资源等测量方法无法在儿童群体中使用。可以肯定的是,儿童的个人社会资本蕴含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在家庭、学校等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爱、支持、尊重等资源对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帕特南(Putnam)认为“社会资本最基本的形式是

家庭”^[14]。儿童在家庭中获得的情感支持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处于经济劣势环境下的儿童,更能从支持性的家庭关系中获得情感满足^[15]。亲子关系、亲子互动、家庭活动是家庭社会资本常用的测量指标^[16-17]。学校为儿童提供了一个获得社会资本的互动场所,师生关系、朋辈关系、学校参与以及教师对学生的期望等成为测量学校社会资本的常用指标^[18]。在社区方面,研究发现,通过社区参与、邻居互动和利用社区资源能够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19-20]。集体社会资本除了社会参与这类可以被观察的、外在的结构性社会资本外,还涵盖了在共同的规范、价值观、态度与信仰的基础上引导个体进行整合性行动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对于移民儿童来说,规范被认为是重要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具有高规范和期望的移民学生网络,可以有效预防问题行为^[21]。方然根据中国的情境将规范操作化为公民责任和义务^[22],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代表了公民面对公共利益时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积极的责任体验可激发个体的责任承担倾向,或增强其道德义务感以及亲社会行为^[23]。就个人社会资本而言,易地搬迁社区儿童在原居住地有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乡村初级社会网络,进入城市后,伴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社会网络的支持与重建对其文化适应具有重要的作用;就集体社会资本而言,易地搬迁社区儿童内化规范的程度,反映了其面对公共利益时的态度、采取的行动以及文化适应的程度。因此,以个人和集体社会资本为切入点编制儿童社会资本量表,可以为了解儿童的社会资本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

(二) 社会资本与文化适应

沃德(Ward)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和贝利的文化适应压力模型均提到了个体的文化适应结果受到个人特质和情境特质的影响,其中群体特质主要包含了关系网络的存在和质量的影响^[24]。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外部保护因素,可以帮助个体减少外部风险带来的压力,并帮助其适应新的环境^[25]。国际跨文化研究发现,留学生的社会网络参与度越高,社会信任感越强,其跨文化适应水平就越高^[26]。在我国的跨城乡迁移群体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社会资本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融洽度越高以及异质性越强,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水平就越好^[27-28]。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沈(Shen)运用普通话的使用作为衡量文化适应程度的指标得出,社会资本对文化适应的影响上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迁出地的持续影响,相较于经济和生活适应,文化适应的过程更慢^[29]。可见,关于社会资本对文化适应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知,还需进一步探讨和检验。

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离开熟悉的村落迁入城市的安置地面临着生活习惯适应、组织适应和思想观念适应等多重文化适应问题。地理位置的迁移带来居住环境、学习环境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变。能否适应城市迁入地的生活和学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父母的情感依恋、教师的积极关注、同伴的友善接纳等构成的情感支持系统能够促进儿童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积极情绪体验,促进儿童的社会文化适应^[30]。除此以外,社区参与也是促进移民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31]。易地搬迁社区儿童进入安置地后,如果能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关系中获得关心与支持,主动参与社区活动与公共事务,那这些儿童在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环境可能更易对自己进行恰当的角色定位以适应新的文化生活。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一:

社会资本能够正向影响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即社会资本越高,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策略越积极。

(三)社会资本对文化适应影响的留守差异

易地搬迁工程引起迁移群体生活环境和生计方式发生转变,大量成年劳动力外出工作,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数量庞大。这一群体面临着家庭缺位和社会环境改变的双重困境^[32]。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家庭不利处境中的多重风险是留守儿童低适应的重要微观环境因素^[33]。易地搬迁社区的留守儿童从农村迁入城市后,由于缺乏父母的情感支持,其在新的环境下安全感、归属感较弱。同时,这种不利往往对留守儿童与其他系统的互动造成负面影响,如由于缺乏父母对其人际交往技巧和策略的有效指导,留守儿童往往表现出社会退缩、不包容、害怕与他人互动等人际困扰问题^[34],以及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增加^[35]和受教育权利受损等问题^[36]。留守儿童伴随着生活环境中的多重风险因素,这些因素倾向于以累积方式发挥作用,且对儿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37]。累积风险因素与儿童发展结果的“负加速模式”(Negative acceleration model)认为,随着累积风险数目的增加,新增风险因素对个体发展的效应越来越小^[38]。从积极保护因素的角度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保护性资源,随着累计数目的增加,可能也存在着类似的“负加速模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逐渐减弱。杜本峰等人的研究证实了保护性资源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影响的边际效应,发现其对困境儿童的影响远大于非困境儿童^[39]。因此,社会资本对拥有相对较多资源的易地搬迁社区非留守儿童的作用可能较小,对于本身拥有较少社会资本的留守儿童来说,社会资本对他们的影响可能要大于非留守儿童。帕特南(Putnam)也指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对于那些财力较弱、教育资源较少的家庭而言,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因素^[40]。对于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来说,社会资本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资源,能够帮助其调配资源以应对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压力。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二:

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的影响存在是否留守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本对留守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大于非留守儿童。

(四)社会资本对文化适应影响的性别差异

在青少年的人际沟通、学校适应以及社会适应的研究中都发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有研究发现,青春期女性的人际敏感性要高于男性^[41],更易在人际交往中产生焦虑情绪,主要表现为与人交流时紧张与恐惧以及担心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从进化论及生物学的角度分析,进化导致了两性在与社交焦虑障碍有关的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上会出现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会使女性更倾向于寻求外界帮助和建立社会关系,但同时也可能增加女性对社交焦虑障碍的易感性^[42]。从亲子关系的角度来看,进入青春期以后,女生的自我评价和主动性可能会有所降低,她们表现出对亲子沟通具有更高的期待和需求,且亲子沟通对女生学校适应的影响大于男生^[43]。情绪社会分享动机的不同也显示出社会资本的作用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向他人分享时宣泄动机更强,而男性在获取他人关注方面动机更强^[44]。这说明女性通过社会关系达成情感宣泄的目的,而男性更倾向于通过社会关系获得他人的关注。因此我们推测,相较于易地

搬迁社区男童,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可能对女童具有更大的影响。此外,女性的社会化程度较男性更高,更倾向于表现出受社会所赞许的行为方式,因而更加主动地遵从并内化学校或主流社会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45]。多项研究表明,女性移民更愿意与移民地人群进行交往,从而更好地缓解移民压力,适应城市生活^[46],相较于男性拥有更高的幸福感^[47]。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三:

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本对女童文化适应的影响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通过云南大学研究生实习团队于2022年9月调查获得,该调查以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D街道H易地扶贫安置社区H小学和福贡县L易地扶贫安置社区S小学为调查地点。其中,H社区是泸水市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于2019年成立,社区居民均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农村贫困人口;H小学于2020年3月开始办学,是一所专门为怒江州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H社区配套建设的小学,学生均为2020年搬迁至泸水市H社区的儿童;L社区是福贡县第二大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于2019年成立,其居民绝大多数为易地搬迁群体;S小学于2020年扩建完成,成为L社区中易地搬迁儿童的安置学校。笔者调查时,以上两所小学的儿童搬迁至城市社区的时间均为两年,正处于城市搬迁社区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方法向两所学校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发放《云南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社会适应调查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1075份。

(二)变量设置与基本描述

1. 被解释变量

文化适应。本研究采用张(Zhang)等人修订的贝利文化适应类型量表^[48],该量表共20道题,包含融合(既能融入主流文化,又秉承着旧文化)、同化(比起旧文化,更适应主流文化)、分离(习惯旧文化,难以融入主流文化)、边缘(既无法融入主流文化,也不适应旧文化)四个维度。采用Likert4点计分,每个分量表分值为5-20分。哪个分量表评分最高,则意味着答题者更加倾向于采取该分量表所对应的文化适应策略。在贝利的文化适应策略类型中,目前已证实整合文化适应策略代表了更好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灵活性,然后分别是同化、分离和边缘化^[49]。根据是否能够融入主流文化,本研究将融合与同化归类为积极文化适应策略,将分离和边缘归类为消极文化适应策略。

2. 解释变量

社会资本。本研究选取《云南省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社会适应调查问卷》中与个人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有关的问题进行编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考查儿童社会资本量表的结构,共23道题,包括亲子关系(6)、师生关系(6)、同辈关系(4)、社区关系(2)和公民权利与义务(5)5个维度,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儿童社会资本因子分析结果

维度	测试题项	因子载荷
亲子关系	我能通过父亲的言谈、表情感受到他很喜欢我	0.713
	我能通过母亲的言谈、表情感受到她很喜欢我	0.726
	我觉得与父亲之间存在一种温柔、体贴和亲热的感觉	0.743
	我觉得与母亲之间存在一种温柔、体贴和亲热的感觉	0.753
	当遇到不顺心时,我能感到父亲在尽量鼓励我,使我得到安慰	0.755
	当遇到不顺心时,我能感到母亲在尽量鼓励我,使我得到安慰	0.766
同辈关系	同学之间相互尊重	0.731
	同学之间相互帮助	0.763
	同学之间团结友爱	0.747
	同学们都很关心他人	0.663
师生关系	老师们很关心我	0.567
	老师帮助学生解决在学校里的问题	0.529
	老师相信我能做得很好	0.627
	学生们被给予机会去帮助(学校或老师)做一些决定	0.510
	学生对(学校或班级)事情有发言权	0.635
	老师让我觉得自己很出色	0.662
公民责任与义务	在家里我常帮父母干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0.685
	在公共汽车上我经常给老人和比我更小的小朋友让座	0.578
	在公园里游玩时,我从不乱扔废弃物	0.696
	我从未在课堂上捣乱	0.667
社区关系	我总是能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0.714
	你和邻居之间的关系	0.708
	你是否参加团体组织活动	0.793
克隆巴赫系数	0.872	
KMO	0.856	
Bartlett球形检验值	8216.673	
p-value	0.000	
累计方差贡献率	55.746%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从个人和学校两个角度选取控制变量。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户籍、留守, 学校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级、住校情况、担任班级干部, 变量赋值情况见表2。

表2 控制变量赋值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比例
性别	女=0,男=1	女51.4%,男48.6%
户籍	乡村=0,城镇=1	农村84.9%,城镇15.1%
留守	留守=0,非留守=1	留守67.4%,非留守32.6%
年级	五年级=0,六年级=1	五年级50.8%,六年级49.2%
住校情况	否=0,是=1	否85.1%,是14.9%
担任班级干部	否=0,是=1	否81.2%,是18.8%

4. 分析策略

根据被解释变量性质,本研究主要采用二分类逻辑斯蒂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进行分析。首先,使用二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其次,采取不同策略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包括社会资本分维度再估计和倾向值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再估计;最后,使用费舍尔组合检验(Fisher's Permutation test)分析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影响的留守与性别差异。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3是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估计结果。在模型1中仅纳入社会资本变量,结果表明其显著正向影响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模型2、3逐步纳入个体变量和学校变量,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保持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社会资本越高,异地社区搬迁儿童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文化适应策略。具体表现为:与采取消极文化适应策略相比,社会资本每增加1个单位,易地社区搬迁儿童更倾向于采取积极文化适应策略的发生比增加181.5%($e^{1.035} - 1 \approx 1.815$),假设1成立。这一结果与沃德的跨文化适应的过程理论相一致。在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个体需要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上对适应压力进行应对,这一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群内和群际接触是重要的个体因素^[50]。特纳(Turner)的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指出,个体转换为内群体的过程是个体根据得到的积极情感和价值意义以及以此为基础与他人进行区分的动力过程^[51]。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更倾向于主动与新的文化环境接触,并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从而表现出采取积极的文化适应策略。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是否住校是易地搬迁社区儿童采取文化适应策略具有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住校儿童采取积极文化适应策略的发生比相较于非住校儿童高69.7%($e^{0.529} - 1 \approx 0.697$)。

表3 社会资本对文化适应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N=1075)

	积极 vs 消极 模型 1	积极 vs 消极 模型 2	积极 vs 消极 模型 3
社会资本	1.033***(0.006)	1.034***(0.006)	1.035***(0.006)
控制变量			
性别		0.990 (0.132)	0.977 (0.132)
户籍		1.605* (0.318)	1.455 (0.292)
留守		0.771 (0.109)	0.835 (0.120)
年级			1.083 (0.146)
住校			0.529** (0.097)
担任班级干部			1.325 (0.244)
pseudo R ²	0.023	0.030	0.04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05,**p < 0.01,***p < 0.001。

(二)稳健性检验结果

针对基准回归的结果,本部分将变换分析策略进行稳健性检验,将社会资本的五个分维度分别纳入模型进行回归,考察社会资本各维度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除了社区关系维度外,亲子关系、同辈关系、师生关系、公民权利与义务四个维度均对易地搬迁地区儿童的文化适应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1总体上得到验证。

表4 社会资本分维度估计

	积极 vs 消极 模型 4	积极 vs 消极 模型 5	积极 vs 消极 模型 6	积极 vs 消极 模型 7	积极 vs 消极 模型 8
亲子关系	1.045**(0.015)				
同辈关系		1.121***(0.027)			
师生关系			1.113***(0.021)		
公民权利与义务				1.058**(0.018)	
社区关系					1.063(0.04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05,**p < 0.01,***p < 0.001。

由于易地搬迁地区儿童的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随机事件,而是由个体、家庭、学校和社区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自选择过程,这可能导致模型估计存在选择性偏误。因此,为了科学有效地验证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本研究依次采用一对一匹配、核匹配、近邻

匹配、半径匹配等方法进行再次检验。并以社会资本得分的均值67为界,划分低社会资本和高社会资本。表5报告了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不同匹配方法下的结果均表明,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易地搬迁社区儿童越倾向于采取积极文化适应策略,即在纠正自选择偏误后,假设1依旧成立。

表5 社会资本与文化适应的PSM估计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t值
一对一匹配	0.742	0.608	0.134***	0.031	4.27
核匹配	0.742	0.618	0.123***	0.029	4.24
近邻匹配(k=1)	0.742	0.608	0.134***	0.031	4.27
近邻匹配(k=4)	0.742	0.614	0.128***	0.032	4.04
半径匹配	0.742	0.618	0.123***	0.029	4.13

(三)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影响的留守差异

为了验证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是否存在留守差异,本研究分别进行留守和非留守儿童样本回归,结果发现,不管是在留守还是非留守的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群体中,社会资本都能正向影响文化适应。简单比较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的系数大小以确定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水平是不严谨的,因此本研究借鉴连玉君和廖俊平的方法^[52],对上述分组回归结果进行费舍尔组合检验。表6左侧仅纳入核心自变量,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留守与非留守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回归系数比较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资本对留守儿童文化适应的正向影响更大。表6右侧纳入全部控制变量,结果同样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留守与非留守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正向影响依旧存在,且回归系数比较仍存在显著差异。综合来看,社会资本对留守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大于非留守儿童,假设2得到验证。研究结果证实了个体—环境交互作用理论在留守儿童文化适应上的体现,良好的社会资本更有利于促进留守儿童的文化适应策略的积极倾向。

表6 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影响的留守差异

变量	留守	非留守	系数差	留守	非留守	系数差
社会资本	0.036*** (0.008)	0.029** (0.010)	0.007**	0.036*** (0.008)	0.032** (0.010)	0.004**
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样本量	725	350		725	350	

注:系数差列的估计结果是使用Stata中的bdiff命令,通过自助抽样(Bootstrap)1000次所得。

(四)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影响的性别差异

为了验证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分

别进行女童和男童子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群体中不管是女童还是男童,社会资本都能正向影响其文化适应。表7左侧仅纳入核心自变量,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女童与男童文化适应的回归系数比较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资本对女童文化适应的正向影响更大。表7右侧纳入全部控制变量,结果同样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女童与男童的正向影响依旧存在,且回归系数比较仍存在显著差异。综合来看,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女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大于易地搬迁社区男童,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处于青春期的女生比男生具有较高的人际敏感度,具有更多的人际关系上的敌意行为和消极情绪^[53],表现出女童对社会资本更加敏感。

表7 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影响的性别差异

变量	女	男	系数差	女	男	系数差
社会资本	0.036*** (0.009)	0.028** (0.008)	0.008***	0.038*** (0.009)	0.030** (0.009)	0.008***
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样本量	553	522		553	522	

注:系数差列的估计结果是使用Stata中的bdiff命令,通过自助抽样(Bootstrap)1000次所得。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易地搬迁群体在迁入地面临着经济、生活、文化等诸多适应困境,容易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对于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来说,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生活对其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云南省怒江州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1075份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主要发现如下。

首先,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社会资本越高,儿童越倾向于选择积极的文化适应策略。来自易地搬迁社区儿童家庭、同伴和教师关系中的尊重、关心和支持等个人社会资本能够帮助其更好地接受迁入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融入城市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中。此外,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承担社会责任与义务等集体社会资本同样是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说明个体的文化适应过程不是机械地被动受到关系网络与环境的影响,而是个体与环境不断交互作用的结果,个体主动去接触、适应新的文化环境非常重要。

其次,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存在留守与否的差异。社会资本对留守儿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大于非留守儿童,说明社会资本能够帮助留守儿童选择更加积极的文化适应

方式。

最后,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存在性别差异。社会资本对女童文化适应的影响大于男童,这可能与人际关系影响和应对压力方式的性别差异有关。

(二)建议

第一,多维度构建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社会资本。从系统论出发,在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与敏感性的基础上,帮助易地搬迁社区儿童重构新环境下的社会支持网络,同时促进个体内部的增能,给予其更多的在新环境下发展社会关系的机会,从而增强他们选择积极文化适应的意愿。具体措施如下:(1)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家长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心理健康和生活适应等方面的关注与关怀。(2)走入学校做好宣传与倡导工作,鼓励教师加强对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关心,创设良好的校园氛围和学习风气,推动学校社会资本的构建。(3)着力将易地搬迁社区打造为儿童友好型社区,促进儿童的社区联结与社区参与。此外,家庭、学校与社区加强合作,通过引导、教育、服务、宣传等手段,促进易地搬迁社区儿童个人层面的增能,提高其心理资本水平,帮助他们主动参与社区事务,采取积极的文化适应态度和行为,积极融入城市。

第二,加强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促进其文化适应。可以通过以下举措提升留守儿童的文化适应:(1)构建家庭—学校—社区联动的支持体系。留守儿童往往面临着社会资本匮乏的问题,家庭、学校、社区社会资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协同育人支持体系,打造家校合作、校社共融的协同育人机制,全面促进留守儿童的文化适应。(2)整合多方资源,激活儿童社区服务的网络与资源。共青团、妇联、关工委、民政等部门充分联动,通过购买第三方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建立以易地搬迁社区为阵地的社区服务体系。(3)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提高留守儿童自我支持水平。要创设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氛围,让留守儿童感受到新环境的包容和接纳,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融入。同时,要注重提升留守儿童的抗逆力和压力应对能力等自我支持能力。

第三,注重社会资本影响儿童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社会资本对文化适应影响的性别差异,可能主要受社会的性别角色期待和社会资本在功能上的性别差异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提升易地搬迁社区儿童的文化适应:(1)家长、学校和社区应注重发挥女童的社会资本的情感支持功能,帮助女童构建稳定融洽的人际关系,通过人际支持提高女童的安全感与城市文化认同。(2)注重发挥男童社会资本中的工具支持功能,给予男童足够的关注,发挥其社会资本的最大功能。

[参 考 文 献]

- [1] 高万红 李晓娇:《边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时空重建路径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 [2] 孙 进:《文化适应问题研究:西方的理论与模型》,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 [3] R. Brislin. Applied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Newbury Park: Sage, 1990, pp.247-248.
- [4] 张春妹 张 璐:《流动儿童的城市文化适应与主观幸福感: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1年第5期。

- [5] 胡发稳 李丽菊 荀利波:《哈尼族青少年的文化适应及其心理效应》,载《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 [6] 柳 曼 杨通华 刘 平等:《云贵地区部分少数民族中学生文化适应应对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载《贵州医科大学学报》,2023年第12期。
- [7] 杨文华 梁谨恋 李 宇:《家庭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载《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2022年第1期。
- [8] 程绍珍 杨 明 程 麟:《班级气氛对初中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载《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 [9] 乔金霞:《少数民族搬迁移民儿童社会融入何以可能——基于优势视角的融入机制与支持网络构建》,载《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
- [10] 刘凌冰:《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适应的差异化路径研究》,载《就业与保障》,2022年第1期。
- [11]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Capital, <http://hal.lamar.edu/~BROWNTF/SOCCAP.HTML>
- [12] Adler, P.S., Kwon, S.W.. Social Capital: 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1).
- [13] 张文宏:《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操作化测量和经验研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 [14] Putnam, R., Bowling, A..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 (1).
- [15] Leonard, M.. Children, Childhood and Social Capital: Exploring the Links, *Sociology – The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05, (4).
- [16] Wu, Q.B., Lu, D.P., Kang, M.. Social Capital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with Different Experiences of Parental Migratio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5, (132).
- [17] Barton, H., Thorpe, J., Dufur, M.. Social Capit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mong German Children, *Social Sciences – Basel*, 2020, (11).
- [18] Li, C., Zhang, Q., Li, N.. Does Social Capital Benefit Resilience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An Evidence from China's Mainland,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8, (6).
- [19] Simkiss, D..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Child Health Systems, *Journal of Tropical Pediatrics*, 2017, (5).
- [20] Tian, F.F., Jing, Y.C., Liu, J.M..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Migration Status, and Chinese Rural Children's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21, (2).
- [21] Mishra, S., Müller, L.. Resources, Norms, and Dropout Intentions of Migrant Students in Germany: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22, (8).
- [22] 方 然:《“社会资本”的中国本土化定量测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 [23] 叶浩生:《责任内涵的跨文化比较及其整合》,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 [24][50] Ward, C., Bochner, S., Furnham, A.. *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 Shock*, East Sussex: Routledge, 2001, pp.43 – 44.
- [25] Addae, E.A..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dolescent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Ghana, *BMC Public Health*, 2020, (1).
- [26] 刘 茜 周 颖 方楠楠:《社交媒体使用如何影响东盟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基于社会资本中介作用的考察》,载《华夏传播研究》,2023年第2期。
- [27] 郑 萍:《现代文化适应中的社会资本建构》,载《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
- [28] 田北海 马艳茹:《文化距离、地域认同、社会资本与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 [29] Shen, S.Y., Xue, M.Y., Chen, Z., et al.. The Static and Dynamic Effects of Capital Factors on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8, (6).
- [30] 江 波 何雯欣:《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适应的影响机制及支持路径:积极心理学视角》,载《教育发展研究》,2019

年第20期。

[31] 陆自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合的因子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4期。

[32] 范兴华 方晓义 赵 纤 等:《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与社会适应:压力的中介作用与心理社会资源的调节作用》,载《心理学报》,2023年第8期。

[33] 唐 倩:《社会加速视域下互联网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代偿与异化——以云南省东川区易地搬迁扶贫点为例》,载《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34] Fan, F., Sang, B.. Absence of Parental Upbringing and Left - behind Children 's Personality, Academic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Behavior Problem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5, (4).

[35] 李佳哲 胡咏梅:《父母情感参与能减少小学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吗?》,载《教育科学研究》,2023年第1期。

[36] 孔炜莉 赵雨馨:《留守儿童教育资源获得和权利保障——以宁夏生态移民地区为例》,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37] Evans, G.W., Li, D.P.. Cumulative Risk and Child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3, (6).

[38] 李董平 周月月 赵力燕 等:《累积生态风险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心理需要满足和积极结果预期的中介作用》,载《心理学报》,2016年第12期。

[39] 杜本峰 王 翮 耿 蕊:《困境家庭环境与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载《人口研究》,2020年第1期。

[40] Putnam, R.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p.214.

[41] 岳彩镇 杨志雯 费秀芬 等:《重庆市某区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载《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2021年第3期。

[42] 程 刚 肖友琴:《社交焦虑障碍的性别差异及其生物学解释》,载《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5年第2期。

[43] 申奥文 高 雯 顾 娟 等:《亲子沟通不一致与寄宿青少年的学校适应:两类应对方式不同的中介作用及其性别差异》,载《心理技术与应用》,2021年第3期。

[44] 陈其锦 黄敏儿:《情绪社会分享动机与社会适应》,载《心理学探新》,2020年第1期。

[45] 赵铭锡:《内地西藏班学生文化适应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载《中国学校卫生》,2012年第2期。

[46] 胡宏伟 曹 杨 吕 伟:《心理压力、城市适应、倾诉渠道与性别差异——女性并不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更严重》,载《青年研究》,2011年第3期。

[47] 张 敏 卢海阳 杨 龙:《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福建省农民工的调查》,载《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48] Zhang, H., Cho, T., Wang, H, J., et al.. The Influence of Cross - cultural Awareness and Tourist Experience on Authenticity, Tourist Satisfaction and Acculturation in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of Korea, Sustainability, 2018, (4).

[49] Tatarko, A., Berry, J.W., et al.. Social Capital, Acculturation Attitudes, and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of Migrants from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and South Korea in Russia,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20, (3).

[51] 闫 丁:《社会认同理论及研究现状》,载《心理技术与应用》,2016年第9期。

[52] 连玉君 廖俊平:《如何检验分组回归后的组间系数差异?》,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53] 欧亚萍:《青春期开始时间早晚对青少年早期抑郁和同伴关系的影响》,载《心理学进展》,2015年第12期。

(责任编辑:崔 伟)